

叶兆言 专注做一件事就好

文 高佳馨



叶兆言

著名作家,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花煞》《刻骨铭心》《仪凤之门》,散文集《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并生于1954年,是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傻小子,一生都在工厂里做钳工,没有享受到任何主角光环。叶兆言对标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和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创作了《叶兆言这个人》。“他做钳工做了一辈子,爱一个女孩爱了一辈子,懦弱与失败都不重要,他的爱有着落,他是最幸福的。”

全书十二章,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历史标志与事件轮番登场,工人、保姆、个体户、教师、警察、知识分子等组成了市井生活群像。叶兆言以说书人的口吻,带着穿越在70年大历史下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小切口叙事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叶兆言表示:“这部小说与我以往的小说最大的不同是,过去很多经验和想法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而《叶兆言这个人》更主观,有太多我的自身经历,有太多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写作时,这些人就在我的眼前浮现。很显然,我正在和自己以及同代人对话。”

在《叶兆言这个人》之前,2022年,叶兆言创作了中篇小说《通往父亲之路》,“算是预备和练习,先试一试刀,就像准备打比赛一样,先做热身,《叶兆言这个人》其实就是放大的《通往父亲之路》。”他对《叶兆言这个人》这部小说期待很高,“在结构和叙事上,我特别强调时间,基本上就是1949年以后的南京历史,所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我都写到了,是我非常着力的部分。坦白说,我写得特别轻松,特别痛快,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写当代的生活。我想把这本书留给女儿,希望有一天她会为此骄傲,自己的父亲竟然写了这样一本书。”

有读者将《叶兆言这个人》与《人间》类比,叶兆言说:“我承认我写的也是人间,不同的作家眼中是不同的世界。”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对叶兆言作品中的平民主义情怀赞赏有加,她评价说:“他所感兴趣的生息不息的生命力,来自民间,来自市井。从他创作的《秦淮三部曲》以及《南京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与眷恋。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1949年之后南京城与人的长篇小说,将南京的历史与文化、人物与风情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呈现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南京城。”

2022年10月,叶兆言和苏童、余华等几位作家被邀请参加《我在岛屿读书》文学纪录片的拍摄,去海南三亚录制。他们在海边踢球、遛狗、吃烧烤,开音乐会,玩年轻人喜欢的解谜游戏,聊着属于他们的年代以及文学。但叶兆言还是愿意回到他的书房里,不停地写下去,这件事能让他感到安心。节目播出后,作家们收获了很多赞美。

叶兆言的女儿叶子已是一名颇有成就的文学专业的学者,她参加了《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的录制。回忆儿时,最大的幸福就是家里有数不清的书,让她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她说:“写作时,我爸爸是一个勤奋、理性的人,做事有始有终,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做好;生活中,他又是一个简单、诚恳、与人为善的人。我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可以努力向他靠近。”

几十年来,叶兆言始终没有离开写作。“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珍贵的倒不一定是年轻时光,而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他都没有放弃追求的精神。我觉得不放弃的人生永远是优美的。”他说。

叶兆言访谈

日复一日孤单地写
生活中写作不可或缺

问:家庭对您有哪些比较大的影响?

叶兆言:祖父和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成为作家,写出来不重要,成不成名不重要,坐在那里的背影很重要。年少时,我看到祖父坐在书桌前的背影,一坐七八个小时,父亲也如此,后来是我,自然而然地坐在书桌前,一坐也是八个小时,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处理其他案头工作,都是以高度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其中。这种朴实的工作状态,不仅是我的祖父、父亲身上闪耀的品质,更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财富。我总觉得父辈比我们更有学问、有文化。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人们专注做一件事就好了。总的来讲,他们会给我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做什么都要好好干,认真干,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记得因为我眼睛不好,很多年前,家里曾认真地希望我不要学写作。父亲和祖父在书信中谈到了这个事,我也的确有过这样的打算。我还做过无线电,玩过摄影,自己做闪光灯,自己洗照片、放大照片。

问:您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

叶兆言:这有一系列技巧,是个技术活。写作要熬,长年累月地坚持。我觉得,作家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一样,日复一日,孤单地写。100万字是一道门槛,不是写得好和坏的问题,就像篮球运动员,必须打那么多球,必须无数遍地练习投篮,练习上篮,无数遍,才能打赢比赛。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必须得这样,才能发现自己到底具备不具备这个才能。成功对写作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享受写作,如果不快乐,为什么要写?老实说,比写作好的行当太多了。

问: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和年轻时相比,写作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叶兆言:我特别喜欢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一句话:“真正的作家是阻拦不住的。”写作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每天清晨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到书房里开始写作或冥想。我把写作视为一种机械的劳动,尽管有时不一定能立刻灵感迸发,但我深知,保持写作的状态和习惯对于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近两年,写得更疯狂,每天能写10个小时,每日多则数千字,少则几百字,没什么可写时反而会焦虑、烦躁,乃至痛苦不安。到我这个年纪,喜欢什么职业,而恰恰还能够从事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问: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您没有其他爱好吗?

叶兆言:我的生活很简单,不喝酒,不抽烟,很少参加饭局,除了写作,唯一的爱好就是游泳。我常常以一种惜福的心态来对待写作。我清楚地知道,写作只对那些愿意读你作品的人,才会有一点点意义。我也知道,今天阅读我作品的人已经不多,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惜,珍惜自己还有写作的能力,还有写作的机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退稿理由大多是主题模糊。”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坚信,只要不断地尝试和努力,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从少年时代到上大学,叶兆言每天保持10小时以上的阅读,什么书都读,没有特别的偏好。阅读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本能,源于内心的需求。他说:“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不带任何目的,纯粹享受阅读的乐趣。读书并不一定有用,读了书会有美好的感觉。只有投入地去读书,书才会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1985年,叶兆言的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在《钟山》杂志上发表,获得了文坛和读者的认可。随后,他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黄昏》在经历了一年的退稿后,于1987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在当时先锋文学的潮流中,他与余华、苏童、格非等人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南京是他的文学地标
展现中国的沧桑历史

叶兆言长期生活在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篇小说集《夜泊秦淮》到“秦淮三部曲”《1937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从非虚构的《南京人》《南京传》到《仪凤之门》,在叶兆言的写作生涯中,南京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标。在他笔下,南京与兴亡、怀旧联系在一起,成为不朽的文学母题。

2019年,叶兆言出版了《南京传》。“南京作为古都,历史上,更多的是维持一种偏安的局面。虽然我以前写过很多跟南京有关的散文,但这次我想通过回顾这个城市的变迁来讲中国的历史故事。我并不是在写地方志,而是以南京为窗口,眺望和讲述中国的历史传奇。”

叶兆言说,有关机构曾对南京市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自称祖籍是南京,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纯正的南京人,虽然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南京人淳朴、听天由命,换句话说,就是珍视当下,懂生活。典型的南京人都是悠闲懒散的,很多事都随它去,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大部分南京人既不会当官,也不会赚钱,不眼红,也不在乎。这就是南京人。”

南京是叶兆言写作的根基,他写了很多南京往事,但他却认为自己写的并不是历史小

说,“我只是借助了历史,就相当于房间里的画,相当于摆在家里的老家具,是一个外包装。我以南京为背景写小说,不是因为有多好、多美、多有诗意,而是用它来叙述中国历史比较方便。南京经历过跌宕起伏,屈辱与荣光频繁交替,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沧桑。”

在他的意识中,南京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一个“被文学虚构”的城市。这些作品都是他用心雕琢的艺术品,他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复杂。如他所言:“在虚构的文学中,当然要真实,要有非常扎实的真相,然而一部好的小说,真实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真实可以随手而来,真实不是目的,好的小说永远都是要写出不一样东西,要无中生有,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和创造。”

叶兆言住在长江边上。在他家窗下,浩瀚的长江拐了个弯,不再是从西边过来,而是浩浩荡荡地南下。他的《仪凤之门》就是一部发生在长江岸边的故事,从晚清写到民国,写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及之后南京城内多种军政势力的更迭。江流有声,一望无际。写作期间,他几乎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窗外渐渐明亮,长江在晨雾中显现,让人产生无尽遐想,给了我相当多的能量。”

著名作家毕飞宇说:“叶兆言是江苏最勤奋的作家,不仅为人谦虚、厚道,更在读书和写作之外,对名利保持着超然的态度。他堪称中国文坛的劳模,以惊人的勤奋和专注,搭建起近千万字的文学宫殿,不仅为江苏文学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也留下了一种人格模式。”

2022年,65岁的叶兆言正式从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岗位上退休。然而他却更忙了,昼夜笔耕,写出了《叶兆言这个人》长达30万字,是迄今为止他所有小说里面篇幅最长的一部。

写大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以小切口叙事唤起集体记忆

相传金陵叶兆言修建于清中叶。叶兆言做皮货生意,颇有家资,大兴土木,建成花园宅邸,但遭遇太平天国以及常年战争,导致一落千丈,繁华不再。时至今日,它被列入历史文化街区,妥善保护下来。

在叶兆言的小说《叶兆言这个人》中,主人公璇天

还有一个现象,上世纪80年代武打片盛行,其中多部都与天津有关。我曾参加国家级课题“天津曲艺老艺人人口述史”,采访了电台曲艺编辑张庆长,通过他的叙述了解到:有一些电影,其剧本就是源自天津评书艺人与曲艺理论家的整理。比如电影《大刀王五》,先是由天津评书表演艺术家于枢海整理改编为评书,在天津电台播出,引起全国听众的反响,受到了电影工作者的关注,将其改编为电影。再如电影《武林志》,也是由天津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演说的快板书《东方旭日红》改编的。这两部电影堪称武打片佳作,也生动展现了天津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无畏,塑造了具有正义感的天津人形象。

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由于天津有习武传统,早年社会追求尚武之风,造就了一批武侠小说作者。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宫白羽和郑证因等人,他们的作品在各大报刊上连载,被书商争相出版。《庸报》就曾连载宫白羽的名作《十二金钱镖》,成为热门读物,后来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通过研究可以清晰地发现,天津武侠题材的评书、快板书作品以及天津历史文化中的尚武精神,都为天津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以天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也为中国武侠影视文学作出了贡献。此外,以津门大侠霍元甲为主题的一系列电影,以及徐浩峰导演的《师父》等作品,都可以说是天津武打片的一种延续。

天津本地电视剧的发展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色类型是喜剧。这不是偶然,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相声大码头,天津人的幽默感源于这座城市的平

和淡泊、低调内敛,衍生出天津人的一种自我调侃,这种幽默的语言被用于电视剧中,犹如把相声从剧场舞台搬到了电视屏幕上,直接影响了津派电视剧的创作。

追溯历史,天津的电视剧除了喜剧,也有不少主题严肃的优秀作品。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天津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血溅津门》,就曾广受好评,至今仍为网友津津乐道。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张孟良的同名小说,田连元也将其改编为评书,在各大电台播出。

参与沉浸式戏剧创作
在“老码头”呈现津菜老味儿

这些年我也参与了一些戏剧创作。一位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为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小梆子班写一出儿童剧,内容是《西游记》的故事。我选了三借芭蕉扇、真假美猴王两则故事,因为它们内容丰富、冲突多,适合舞台表现。我不想破坏原著的面貌,但也加入了时代元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根据儿童观众的特点,压缩唱词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加好看、热闹。

2022年,我做了一个关于沉浸式戏剧在天津发展状况的调研项目,走访北方演艺集团,结识了郭鸿斌老师。恰好他们打算创作一部讲述天津饮食故事的沉浸式话剧,与西青区文旅局、印象城、老码头菜馆联合制作,邀请我担任现场剧本的文学编辑。于是,我从建组到排演,全程参与了这部剧。

最初剧名叫《老码头1929》。初始创意是,搭建一个复古风的戏剧环境,参照北京人艺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故事格局,用代表津菜的几道菜品,引出几名厨师之间的矛盾冲突,结尾接续大家团结合作,成立一家餐馆,弘扬津菜。

一开始我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专长,从多年积累的文献资料中选取老照片和大大小小的事件,比如从当年的《庸报》上搜集天津的社会时尚,特别是餐饮方面的信息,提供给编导。这部剧最终定名为《老码头戏里戏外》,2023年年初首演,开创了天津商业场景与戏剧结合的先河。

讲述

1896年电影进入天津,影视行业逐渐凸显特色

武打与喜剧是津派影视的根儿

口述 郝天石 撰文 刘小兵

郝天石供职于天津市艺术研究所,曾获天津市文联颁发的“天津文艺新星”称号。他长期从事戏剧和影视理论研究,捋清了天津本地电影、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天津的人文历史。

回顾早年天津电影行业
改变了大众的娱乐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家属院区出生,是家里第一代在天津出生的孩子。我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书,喜欢各种插图书,四大名著。除了读别人写的书,自己也喜欢写一些小文章,记叙生活点滴,也模仿一些侦探、武侠影视剧的情节,写一些短小的场景段落。阅读、思考、编故事,成为我生活的有益补充。

上大学时,我钟情比较文学,随着对文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对文学改编影视产生了浓厚兴趣,看了很多电影,也读了很多电影类书籍。毕业选题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影片、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的文学改编,后期又对他的《断背山》和《卧虎藏龙》进行了比较性研究。

毕业后,我进入天津市艺术研究

所工作。过去看似轻松的观影观影,变成了带有任务性质的业务学习,看似可以信口开河的口头评论与抒发个人感受的笔头评论,都需要反复斟酌后才能发出,因为从事这个专业,就得干专业的活。慢慢地我找到了一个方向,开始深入研究天津电影的历史,以及与天津有关的影视作品。

1895年12月28日,电影在法国诞生。1896年,法商百代公司乘着天津有法国租界之便,开启电影市场,在天丰舞台放映电影。当时被称为“光影戏”,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我考据过一些文献,“电影”这个词,最早还是出现在咱们天津的《大公报》上。

颇有名气的权仙茶园,是天津乃至全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娱乐场所,由法商百代公司的周紫云开创。刚开始由外商租赁场地,后日渐壮大。该影院放映影片的数量多,质量也有口皆碑,寓居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常邀权仙茶园的放映员来居所放映电影。

据《大公报》《庸报》记载,上世纪20年代,在电影没有广泛传播之前,天津的娱乐市场占绝对优势的是戏曲。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天津沦陷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在天津的娱乐市场上,电影成为主角。外国片居多,国产片较少,许多海外电影公

司在天津建立了发行机构,天津地区

的影院可以同步放映好莱坞新片。那一时期,天津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流动性很强,绝大多数会流向上海,因为那里云集了众多优秀的演员、导演和制片,包括代表革命力量的左翼电影。天津本地也出现了电影制片公司,不过自产电影很少,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制片制度。因此,如果单纯从娱乐市场的繁荣程度去看,天津算得上当时电影业的一线城市,拥有相当多的优质影院;如果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审视,天津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亮眼。

武打片与天津颇有渊源
《血溅津门》让观众难忘

1958年,天津电影制片厂(简称天影厂)成立,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红旗谱》,成为天影厂的奠基之作。难能可贵的是,改编该片的想法也是由天影厂提出的,说明在建厂之初,他们就拥有宏大的抱负,定位高远。

上世纪80年代,天影厂根据金庸名作《书剑恩仇录》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这是内地第一次把金庸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引起很大反响。上世纪90年代,《香魂女》《凤凰琴》为天影厂带来了国际声誉。



郝天石